

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9月19—20日,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为主题的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修志机构、方志收藏机构与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50余人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作为外宾代表致辞。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长,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冀祥德主持开幕式,并作大会主旨演讲。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玉宏、邱新立出席会议。闭幕式由刘玉宏主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李国庆教授作为与会外宾代表作会议总结,邱新立作大会总结。邱新立,中国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馆长徐鸿博士,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廖运建,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汪德军,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田洪洪分别主持大会各单元学术交流。

李培林在题为《加强方志文化交流 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致辞中指出,方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化、弘扬历史传统的重要方法和载体,承担着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同时,他强调,本次研讨会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为主题,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平台,不断加强与海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志鉴收藏机构以及有关组织和个人的交流合作,分享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整合资源、汇聚力量,共同推动方志文化以其独特的载体形式和丰富的人文内涵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他希望海内外嘉宾能利用好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平台,互学互鉴,共享共赢,共谱方志文化世界篇章,共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冀祥德在题为《论方志文化自信》的主旨发言中,详细梳理了中华文化与方志文化之间的关系,介绍了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和方志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资料性、权威性等基本属性。方志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与价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时代价值。以方志文化自信为逻辑起点,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方志文化应当勇于担当,发挥引领作用。

此次会议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盛举,也是继2011年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地方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采取以文与会方式,经过专家评选,共有76篇论文入选。会上有45位学者作大会交流发言,并专设自由点评环节,供与会专家学者交流。

一 会议研讨内容述要

本次研讨会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方志文化及其价值

研究、方志文化的传播研究、方志收藏现状及其学术价值研究、方志编纂及其理论研究、境外方志编纂研究、东西方年鉴比较研究、地方志开发利用研究、方志信息数字化研究等方面展开讨论,并展示和分享了众多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 中国方志文化及其价值研究

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方志文化及其价值研究在此次会议中最为引人注目,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研究方法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方志文化研究仍在方志界占据重要席位。

吉祥《拓宽方志的视野: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方”与“志”的比较研究》考察了中西方语境中“志”与“方志”的语言转换和文化理解,比较了中国方志与西方地方史(志)、西方人类学民族志背后的文化生成机制及其特征特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建立中国版看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志,并提出适应走出去战略的中国方志发展转型,将相对于以中国为天下的“地方”志改造为相对于以世界为天下的“方”志。姜潮洋《纵与横——中国方志的文化坐标》将方志文化置于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从纵横两个维度来论述方志文化的根系作用。从纵向层面介绍了上古神本文化、先秦轴心文化、唐宋市井文化以及明清异域文化等各时期的方志体现;从横向层面介绍了方志文化与地学文化、文学、民俗文化的交融。纵横交汇处,就是方志所蕴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的精神与思想。

李秋洪《方志文化传统的当代定位》通过方志文化的历史定位、当代文化价值定位、当代功能定位、当代市场定位等方面,提出了对方志文化当代定位的认识。认为应明确自身的历史定位和当代定位,以确立创新与发展方向,而摆脱地方志困境的唯一出路是着力于功能创新、内涵创新、机制创新和学科建设。廖运建《促进地方志转型升级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持——地方志转型升级实践探索》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实际,提出地方志转型升级的条件已经形成,进而解析了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方厦《浅析文化认同视野下地方志对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一文就当前台湾文化认同呈现的复杂问题,从加强地方志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阐述在文化认同视野下,地方志对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赵燕秋在《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传承中华历史文脉 构建新疆方志文化自信》一文中分析新疆方志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提出新疆方志应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在传承中华历史文脉的同时,构建新疆方志文化自信。彭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方志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新疆方志文化发展为例》以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地位为研究内容,阐述“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方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承载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地方志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与方法。

夏传玉《新常态下的方志文化传承与创新》认为新常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必须主动适应的新环境,并分析了在新常态下方志文化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如何定位和谋划,如何培养、使用和留住人才等问题。谭烈飞《从“专”志的编修看方志的继承与创新——以北京地区专志编修为例》以北京地区专志为例,梳理了“专”志的种类、专业志记述的主要内容,以及专志的体例和编纂特点,认为专志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并且在传播地情文化、进行传统教育和促进海内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李仁喜、余祖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传承背景下方志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研究》一文阐述了方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方志文化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官方媒介、核心典籍和重要推力,应在方志文化中增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创新体制机制,开发多元的方志文化产品,创新方志文化的传播途径与手段,以保持方志文化的角色功能。苏炎灶《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对方志文化的再认识》从全新的视角对方志文化的过去与未来进行探讨,通过中国特色记忆和世界未来发展阐述了方志文化的内涵和传播。

刘爱军《关于发挥地方志独特作用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的研究》介绍山东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主要进展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提出将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在志鉴编纂工作中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充分利用地情网站、地情资料库、方志馆的作用等方式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陈其弟《方志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方志的苏州贡献》从苏州方志的起源,苏州旧志对宋代方志体例定型的影响,苏州乡镇志编纂规模,以及苏州方志事业的创新和探索等方面,介绍苏州在方志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齐家璐《借法舫文化与方志文化舞台唱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大戏》介绍了法舫其人与他的佛教思想,法舫文化的提出源于地方志,以及法舫文化研究对方志功能拓展起到的积极作用。法舫文化和方志文化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在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海峡统一、加强世界各地华人的联合等方面是最具凝聚力的媒介。高志刚《地方志与地域文化记忆构建——以成都方志与巴蜀文化为例》通过阐述成都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说明地方志在地域文化记忆构建中具有其他载体不能替代的引领作用,并结合成都地方志实际工作,探讨成都地方志构建地方文化记忆的探索。程汝明《传播方志文化 成就精品志书——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阐述云南省普洱市在实际修志工作中,围绕传播方志文化、扩大方志影响力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赵海渊《弘扬方志文化要处理好十大关系》首先对文化、方志文化、文化自信和方志文化自信的概念做了界定,在此基础上,阐述弘扬方志文化过程中需要重视历史与现实、否定与吸收、守旧与出新、内容与形式、真与伪、变与不变、法治与非法治、区域与整体、区域之间、中华方志与世界文化十大关系。殷勇《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关于增强地方志学术性的若干设想》提出构建中国方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存在着一条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的普遍主义道路,而中国方志学及地方志同时面临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的诉求。史天社《地方志话语体系概论》对地方志话语体系概念、属性、结构及建设运用进行梳理,认为地方志话语体系是地方志话语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表达体系,是地方志内容知识体系、内在构成体系的外化表达方志,其实质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刘善泳《方志文化的三个认识维度》认为大众意义上的方志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中国地方志的文化底色、中国方志人的文化角色,以及中国地方志事业的文化自觉。雷卫群《方志概念的扩展》认为现代大量修志实践的开展,拓展了传统方志概念,如地方志书不再局限于一个行政区划、事件志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修志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修志向多方面的社会主体转变等。

有些学者还就如何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见解独到的思路和方法,并对未来方志文化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研究。王铁鹏《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介绍了对方志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认识,以及近年来中国方志界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举措。方志文化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关键是增加方志文化自信,自觉融入国家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整合全国方志资源,加强与国外学校的

交流与合作。潘捷军《中国方志文化“走出去”：理念嬗变与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乌镇志〉的编纂指导实践》着重从理念嬗变与方式选择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乌镇志》在编纂指导实践中所作的有益探索。并认为，方志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需处理好志书对外传播总体定位、志书编纂主体理念和总体框架、志书编纂方法如何把握、志书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形式等问题。

（二）方志文化的传播研究

此次会议在方志文化的传播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研究不乏新见。

黄真龙《中华民国前地方志在日本的传播——试论述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传播途径》以中华民国前地方志在日本的传播为研究内容，运用文献法与对比研究法，探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传播途径。丁玉恒《唐代以来中国地方志在海外的流传及其影响》分别介绍了唐代至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志在海外的流传情况，以及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地方志的影响，认为地方志可以在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整体构架之中，积极发挥联系历史与现实的信使作用、联系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用。沈永清《海峡两岸史志文献互补血缘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上海通志·徐孚远〉和〈台湾通史·徐孚远〉比较研究》通过对《上海通志》与《台湾通史》关于徐孚远记载的对比研究，探讨海峡两岸史志文献互补的意义。陈忠《传播学视域下的〈宗教志〉价值利用研究》介绍了《新疆通志·宗教志》的特殊地位、传播教化路径，阐述该志价值利用的现实意义，指出该志对宗教管理者和宗教理论研究者进一步准确把握宗教发展规律、促进新疆宗教领域团结稳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张瀛辰《从G20峰会看方志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G20峰会为例，介绍峰会中的传统文化元素，进一步分析峰会中地方文化的跨文化表达对地方志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张健《“方志故事”在传播中的角色》一文提出“方志故事”的概念，认为“方志故事”有助于方志文化的传播，能够在帮助中国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同时，提升地方志的影响力，并指出传播“方志故事”时应该使用多种媒体平台与媒介形式。池诚《互学互鉴是推动地方志文化发展传播的重要方法》阐明地方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西学东渐以来，方志文化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通过互学互鉴，方志文化必将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方志收藏现状及其学术价值研究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境外的学者们以及国家图书馆的学者还就各自馆藏方志文献情况及其学术价值发表相关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郑炯文《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地方志与统计年鉴的收藏》介绍美国哈佛大学基本情况、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情况，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地方志与统计年鉴的收藏和利用情况，指出馆藏1949年以前的旧方志约8000本，1982年以后的新方志约35000本。邱颀、沈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简述》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历史、基本馆藏及地方志收藏情况，指出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现有中文典藏已超过110万册（件），为中国本土以外最大中文馆藏，而地方志是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的一大特色，包括约3500种1958年之前出版的方志和800余种明清善本。潘铭燊《国会图书馆早年收藏中国方志略述（1869—1937）》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100多年前的方志收藏历史，指出国会图书馆最早的中文藏书，是通过外交活动、政府间馈赠交换、专人访华采购而获得，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朱士嘉整理、编目时，国会图书馆收藏方志2937种、56989卷，为中国以外最多，研究价值极高。李国庆

《北美中小图书馆藏中国方志初探》介绍了北美一些中小型图书馆所藏方志的情况,指出北美约有近百家各种类型图书馆收藏有数量不等的中国古籍(1911年前成书者),中国古籍方志在海外中小图书馆的存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邹秀英《克莱蒙特学院联盟图书馆藏原版旧方志简介》介绍美国克莱蒙特学院联盟图书馆藏原版旧方志的收藏源流、类别、版本年代、涵盖地域以及珍稀程度,并附所藏旧志目录清单。旨在反映中国旧方志在小型汉籍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为海外旧志的普查清理与开发利用研究提供相关信息。张毅《皮藏与传承:国立北平图书馆抄藏方志述略》介绍国立北平图书馆有关抄藏方志的情况,指出抄藏方志近70种,抄写时间较为集中,缮写精良,底本多为清志,但不乏现存稀见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四) 方志编纂及其理论研究

方志编纂及其理论研究历来是方志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与会学者从不同层面做出相关研究。

在方志编纂理论的研究方面,程洪《地方志体裁的演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宏观的史学方法论探索》从探讨地方志的体裁入手,分析地方志体裁从成型到转型的历程,揭示了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结构变迁的区域经济、基层影响力、亚文化等三个要素。进而探索影响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若干新要素,诸如权力机构的简化、公民社会的崛起、信息优势的影响和数据技术的应用,以及这些新要素对地方志和地方志体裁的影响。尤岩《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走向未来:史景迁中国史研究、影响及对地方志编纂的启示》围绕方志文化的内涵、形式、变革与创新,探索史景迁中国研究的史学观、史料来源、研究方法以及传播和影响,分析其对当下方志研究与编纂的启发与借鉴作用。沈松平《试论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在体例上对旧志的继承和创新》分析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在体裁、框架结构,以及志书类型、生不立传、述而不作、志书自注等方面对旧志的继承与创新。同时认为,应认真总结新中国第一、二轮修志的得失,肯定其中已形成的规范性做法,坚决杜绝另起炉灶重开张的做法,只有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或陷入假象创新、盲目创新、否定式创新的泥淖。

在方志编纂研究方面,马小彬《历代四川方志的编纂及收藏情况》在爬梳历代四川方志的编修情况和现存及收藏情况后,对四川方志的特点及价值进行分析。四川地区自东晋时期即有常璩《华阳国志》的编纂,此后历朝历代累计修志千余种,具有编修历史悠久、数量多、种类齐、内容丰富的特点,为“存史、资政、教化”重要参考。汪德军《从编修背景看西藏地方志的特点及价值》分析西藏旧志和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背景及特点,提出作为西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旧志与新志因编修背景和作者身份的不同,体现出不同特点和价值。张英聘《弘治〈八闽通志〉编修体例与文本书写》通过梳理明弘治《八闽通志》的纂修体制、编修体例、史料来源,以及该志在文本记述上的特点,指出透过该志编修的研究得到的几点启示:一是明代官修方志的传统得以弘扬;二是学者主持编纂,保证了志书的学术价值;三是修志要有史裁法度,注重资料的可信度并加以考证。黄菲《帝国边疆美景:清代西南方志中的山水书写》以滇东北地区的几部清代志书为例,选取清初东川府十景移建为个案,探讨在巨大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新旧城市景观的转变,以及各类地方群体对其的建构和解读。熊蜀黔《明清时期三部〈重庆府志〉比较研究》将明成化、明万历、清道光时期的3部《重庆府志》从编修背景、编修动机、编修模式,志书体例、资料来源和编纂者对志书质量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各部志书的价值,认为万历《重庆府志》能被誉为明代府志佳品,与其

编纂班子一丝不苟的编修工作态度和对后世负责的责任心息息相关。徐鹏《光绪〈新市镇再续志〉考释》对成书于民国4年(1915)的光绪《新市镇再续志》作了认真考证,梳理其作者、史迹和版式、源流,探讨其得失、价值,指出该志篇目灵活、体例适宜,文本富于张力,不仅见证了一个有着编修方志传统古镇的文化品格与历史变迁,而且有着垂之久远的价值。郑云艳《从〈(雍正)湖广通志〉看湖湘地方教化与湖广分省》以雍正《湖广通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湖广分省与两湖通志合修分载的体例特征,以及该志对两湖通志独立纂修的影响,认为该志的体例内容虽然呈现着“分载南北”“南北趋平”的特征,但仍为湖广分省提供了舆论准备,为之后两省通志分纂奠定了基础。李艳玲《道光时期“厦金二岛志”比较浅析》以道光时期《厦门志》和《金门志》为研究对象,详述了“二岛志”的编修缘起、成书始末、异同分析,以及成书过程和体例内容对当今修志的启示。韩章训《谈域外志发展》以域外志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不同历史阶段域外志的发展,探讨当代历史、地理和方志学界对域外志的研究问题。

在简志编纂和专志编纂研究方面,阳雍悦《探讨地方志书编修如何传承体现乡土文化特色——以〈湖南乡镇简志〉编修为例》是以《湖南乡镇简志》为例,从分析地方志书在传承乡土文化中的全面性、权威性和真实性入手,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实证相结合、文本解读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地方志书在编修中如何传承乡土文化特色。周琪《文艺专业志书的编纂与价值——以〈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为例》在分析《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曲艺志》的编纂、体例特点、对学科建设的作用与意义后,指出两志在编纂上存在的问题,结合编修实践,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新方志研究方面,薛燕《浅析新县志中的统计数据》梳理了中国县志统计年鉴的现状和局限,以及县志中统计数据的类别等内容,认为县志中统计资料的一致性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很多独特统计数据也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所需要,但还需在一致性、独特性、准确性和数据来源方面加以改进。赵嘉朱《试论新方志发展初始阶段的特点》认为1949—1966年为新方志发展的初始阶段,新方志的推进在建立中央一级领导机构、与档案事业及地方史发展紧密关联等方面显示出过去所未有的新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初始阶段新志编纂的大发展,而且对改革开放后的新方志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任根珠《续志“大事记”篇的编纂实践与转型》从大事记篇的编纂实践入手,权衡、探讨不同记述时段的利弊得失,提出大事记篇应遵循上限不等高、下限一刀切的编纂方式,使其回归传统,进而发挥大事记应有的功能作用。

(五) 境外方志编纂研究

近年来,境外地区和国家修志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渐成学者们一个新的关注点。此次研讨会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并提出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有价值的见解。

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修志研究方面,刘智鹏、刘蜀永《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修志》一文梳理了香港修志的缘起、意义、特点、设想以及修志现状,提出了设立香港地方志资源中心的构想。张家麟《〈妈祖文化志〉的书写:台湾大甲镇澜宫绕境进香个案》介绍台湾妈祖绕境的热闹现象,从个案的角度陈述了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进香及其组织、组织互动的内在现象。并指出,除了表象的人潮与热闹之外,应该认识到其内在的各类组织及组织互动,这才是大甲妈祖绕境现象的关键因素。

在海外方志编纂研究方面,阿部由美子《日本的方志编纂事业概述》从日本古代、江户时

代和近代等三个时期介绍了日本地方志编纂情况,指出日本各时期的地方志事业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而各地史志著作仍在不断编纂和研究之中。阮友心《越南编撰县志的现状——以清化省诸县志书为例》介绍越南清化省各时期的修志基本情况,希望通过清化省的县志编撰经验,为越南其他地方在体裁选择、编纂方式、组织筹备等方面提供有益借鉴。王晓燕《美国史料文献收集保存传播一瞥——以2009年宾汉姆顿枪杀案记录查询为例》以2009年宾汉姆顿枪杀案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查询该案史料的过程,略窥美国各级政府及民间对近期史料的保存整理与数字化的流通。

(六) 东西方年鉴比较研究

东西方年鉴比较研究方面的论文,为会议带来了更多新鲜的学术气息。

崔震《以〈世界年鉴〉和〈南非年鉴〉为例谈谈年鉴电子书的出版》从获取方式、文件格式、资料性、便捷性、观赏性五个方面分析了《世界年鉴2017》和《南非年鉴2015/16》电子书的异同,认为年鉴也必须顺应数字化阅读的趋势及时出版电子书,提出要在借鉴各种电子书出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年鉴电子书的定位,以高质量的后期技术处理,确保年鉴电子书发挥好自身作用。黄俊军《中美年鉴的比较研究——从美国〈世界年鉴〉编纂出版反思中国综合性年鉴的现状》选取美国《世界年鉴》作为中美年鉴的比较对象,指出中美年鉴在年鉴栏目设置与记载内容的重点、读者对象、内容表达形式等方面的不同。

(七) 地方志开发利用研究

在大量地方志资源成果出版的基础上,方志开发利用的全方位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化。地方志作为地方文献中的大宗,在历史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牛润珍、宋羽《宋元之际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以〈延祐四明志〉为中心的考察》详细爬梳了元代《延祐四明志》中关于当地寺院蓬勃发展和高僧生平事迹的佛教史料,认为这些史料展现了宋元之际四明地区文化繁荣、官民崇佛、佛教尤其是天台宗和禅宗的发展情况,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宋元之际四明以及江浙一带的佛教发展。鱼宏亮《跨越地理环境之路:历史上的农业与贸易——以明清时期长城带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著名的“地理界限”——长城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就16—20世纪以来发生的跨境农业与贸易活动及其文化影响,可以看出古代中国范围内各地理单元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真实影响。崔思朋《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基于考察报告、方志文献等资料的历史考察》以清代以来的考察报告及方志文献资料等文献为基础,根据当代生态区域划分标准,对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刘书峰《身份认同与方志教化功能的拓展——以广播电视为例》以广播电视志的编修如何重塑广电人员的集体记忆以及广电从业人员形成身份认同为例,立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着重思考和分析地方志如何通过建构集体记忆进而构建身份认同。刘峰《基于志书考察的海宁历代盐业研究》对志书中记载的海宁古代盐业生产情况和盐业与海宁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指出盐业为海宁带来巨大财富。胡训珉《“上海”地名含义试解》利用方志资料对上海地名的含义作了剖析,通过检索黄海、东海和长江口的水文资料,发现长江口沿海区域的某些水文特征,符合先民关于“上洋”“潮源”的描述。罗志《阳明心学、明儒与滁州人文气质——以地情文献为主要材料》认为在继承发扬阳明心学精髓的过程中,更需要扬弃其注重日用、内敛空虚的思想倾向,创造出当代滁州人的文化自信和人文气质。张军《论地方志在安徽建省时间之贡献》以地方志为主要史料,从江南省析置过程,安徽成固定的名称,拥有完整的机构、固定的驻地、职能、行政官员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证,说明地方

志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史料作用。莫艳梅《〈萧邑郁氏宗谱〉之郁达夫祖籍家世考——兼论家谱对地方志的贡献》根据《萧邑郁氏宗谱》考证萧山郁氏、富阳郁氏的源流以及郁达夫的祖籍家世,认为家谱蕴藏非常丰富的微观资料,对地方志书有补史、详史、考史、证史作用,可大力开发利用。

(八) 方志信息数字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进一步发展,方志信息数字化研究渐成学者们一个新的关注点。与会学者们结合地方志工作实际,对信息数字化研究有颇为深入的讨论。

戴思哲《中国地方学校图书馆藏书数据库》介绍作者与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PIWG)的合作研究项目情况,即用马普所创建“地方志研究工具软件”来搜集宋代到民国地方学校图书馆书目,加工和创建公开的数据库,指出该数据库将帮助研究人员检查学校图书馆图书流通趋势。彭慰《台湾方志数字资源评析》详细介绍台湾的各种方志数字资源,并分析这些数字资源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认为目前有关台湾方志的数字资源对于研究台湾的学者或文史工作者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刘满平《国内地方志数据库比较研究》以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数据库收录榆林地方志情况为例,探讨各种地方志数据库的优劣,有利于读者对方志数据库的了解,以及读者对方志资源的利用。沈萌微《论“地方志+GIS”——地方志开发利用的新方式》梳理了GIS、HGIS的概念,以及二者对方志资源的利用情况,阐述“地方志+GIS”这一地方志开发利用新方式的来源、特点和意义。

(九) 其他

有关旧志整理、地方志索引研究在方志研究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使研究走向深入细化所必须加以注意的。这次研讨会对旧志整理、地方志索引研究都有所涉及,在研究深度上有明显的进步。

在旧志整理与研究方面,严忠良《清代湖北散佚方志述略》对清代湖北方志散佚概况及其特点、散佚原因,以及贮藏方法对方志散佚影响进行梳理,认为通过探究清代散佚旧志数量、特征、原因等,不仅有利于明晰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状况,丰富湖北方志研究,也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认识清代湖北方志发展脉络及规律。杜涛《〈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校勘记——兼谈旧志整理中信息化资料的利用》介绍了利用多种旧志整理中的信息化资料,对《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中的进士部分进行校勘整理的情况。并指出,利用信息化资料整理旧志,可以很方便地正旧志之讹、补旧志之缺,开启旧志整理工作的新局面。马少甫《榆林市县(区)旧志书目补正》梳理了榆林39部现存旧志,指出其中存在书目遗漏、版本著录讹误和馆藏分布信息不确切等瑕疵,并经详细考证,得出了更为确切的榆林志书书目,对原有信息作了更正。

在地方志索引研究方面,王雅戈、李炜超、郝建华《地方志与国际接轨的对接点——索引——写在国家标准〈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编成之际》提出索引是地方志与国际接轨对接点的观点,论述地方志索引标准可以促进地方志与国际接轨,并以《苏州市志》索引为例评介地方志索引的特点,思考了已经出版的地方志未编制索引的问题,总结地方志索引编制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

二 会议特点评析

此次研讨会采用以文与会的形式,研讨内容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国际性的特点,是一次高

规格、高质量、高水准的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不仅展现了方志界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还成为境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交流对话、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为促进方志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碰撞、开拓研究思路、进一步推动方志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的主要亮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会议组织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

本次研讨会在议程安排上着力体现学术性,从而形成了会议安排紧凑、内容务实和重学术、追求创新的特点。学术研讨会有没有学术创新的追求,关键在于会议主办方的学术思想。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了“中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推进中国方志文化走出去既是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也是加强与海外史志编研机构和藏书机构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自工程实施后,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赴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进行地方志学术交流,并取得丰硕成果和显著成效。

此次研讨会作为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任务之一,自筹备以来,受到境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积极的参与。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和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方志文化研究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研讨会显示出一种创新的追求。正如会议的主题“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和认真探讨方志文化的价值以及传播发展,是方志文化研究新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而一批观点新颖,颇有建树的学术论文的入选,也正好见证了这种学术创新。

(二) 会议议题新颖且见解丰富

此次研讨会所收论文选题新颖,见解丰富,既展现出方志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又体现出方志文化在实践中的成果。大会在短短两天的日程中,安排45位学者作大会发言,围绕方志文化及其价值的研究、方志收藏研究、方志文化的传播研究、方志编纂研究、东西方年鉴比较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些论文立足实际工作,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基础上,展现了研究者独特的地方视角,实现地方志工作与方志文化建设的有机互动;有些论文公布并整理研究了一批馆藏志鉴资料,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些论文对方志学问题的分析已超出单一学科方法论的限制,使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因而能够推陈出新,拓宽了方志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方志学研究推向深入;有些论文帮助我们了解到境外的修志情况,如日本、越南等国家受中国文化影响,延续了修志的传统,且修志理念和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这些论文中,我们领悟了方志文化的内涵精髓、挖掘了方志文化的时代魅力,丰富了方志文化形式内容。

(三) 学者队伍呈现多元化、国际化

本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与会人员不仅有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也有地方志机构工作者;不仅有历史学、方志学、图书馆学等方面的资深学者,也有不少致力于这些方面研究的后起之秀,并且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观点。学者队伍的多元化、国际化表明了方志文化日渐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与会学者既有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也有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更有一大批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可以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欢聚一堂,围绕方志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展示了方志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和独特魅力。

此次研讨会在发言设计上,除采取全程大会交流形式,还安排了自由交流讨论时间,促进了与会者的互动分享和思想碰撞。

三 方志文化研究的展望与期待

无论从学术规模,还是从学术层次上讲,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堪称一次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对方志文化予以多视野的深度观照。而此种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方法,也代表了未来方志研究的新趋向。研讨会充分利用方志文化在境外的影响力,为相关领域同行提供一个深度交流的学术契机,同时进一步提升或扩大了方志文化研究的学术认识、问题认识和国际视野。

就整体来看,大会论文不仅可视作近年来中国方志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而且集中反映出我国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趋势。虽然,目前中国方志文化研究出现了很多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但问题依然存在,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多从理论和实际工作角度探讨方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等,很少从未来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方法、目标和途径等角度提出建议。第二,当前海内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学术界尤其是东西方地方史、年鉴比较研究较为薄弱,不能与之相适应。同时,海外地方史、年鉴的现有成果借鉴也不够,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三,在方志的传播与利用方面,调查研究工作还需要加强,将来的研究方向会朝着更加关注方志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可以使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步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与境外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全面了解境外志鉴和地方史编修状况,以及中国方志收藏情况,以为借鉴;二是通过各种形式介绍与传递中国方志事业发展成就,以及方志学研究成果,使境外更多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方志文化,以便在相关研究领域架起中外相互交流和密切合作的桥梁,最后达到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目的。尽管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与会学者和方志工作者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方志文化自信体现为将方志文化推向世界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邱新立在会议总结中所说,方志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思想情感的智慧结晶,既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又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把方志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是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与世界各国人民加深互相了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重视。近些年来,中国方志界与海外高校、藏书机构、科研机构交流日益频繁,为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当前,中国地方志事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方志文化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如何使方志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魅力等方面贡献“志”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值得我们共同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刘丹执笔)

本文责编:周全